

“追随艾田蒲的脚步，重温一位世纪学者的历程”：跨文化对谈在法国大使馆文化中心举办

2016年3月31日，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特邀法国作家、批评家，文学政治批评杂志《查理》（*Charles*）主编阿尔诺·维维昂先生和《跨文化对话》执行主编钱林森教授，就世纪学者艾田蒲的创作与影响为中心话题，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联袂对谈，并与现场听众交流互动，收到了热烈欢迎。《北京法文周报》（*Beijing Information*）记者雅克·傅力叶（Jacques Fourrier）对这场别开生面的跨文化对谈做了现场报道，撰文《世纪文人艾田蒲》，刊发在《北京法文周报》2016年4月，我们征得傅力叶先生赞同，将之译成中文，发表于此，以饕《跨文化对话》广大读者。

——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，图书与思想辩论部，张琦、周梦琪（Clémentine Blachère），2016/7/1，北京

世纪文人艾田蒲

3月31日，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组织了一场由阿尔诺·维维昂先生（Arnaud Viviant，法国文学批评家及作家）和钱林森教授主讲的讲座，谈论法国汉学家艾田蒲的著作和思想。

艾田蒲，说起来也许是法国一位被遗忘的知识分子，仅仅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猜想他是启蒙时期的一位哲学家，就像伏尔泰、霍尔巴赫、萨德侯爵，而不会想到他是一位不起眼的老师、曾经巴黎高师的寄宿生、汉学家、作家，他的文笔被整个20世纪独占鳌头的让·波朗（Jean Paulhan）所掩盖。正是这位艾田蒲，这个有着矛盾命运的文

人，成为了维维昂先生和钱林森教授谈论的对象，讲座的主题是：世纪文人艾田蒲——追随艾田蒲的脚步，重温一位世纪学者的历程。

命运悖反的文人



艾田蒲肖像

艾田蒲出生于1909年，他像同时期的一些杰出人物一样，很快地完成了基础教育阶段，于1929年进入巴黎高师，师从杜夫海纳（Mikel Dufrenne，哲学家）和雅克·苏斯戴尔（Jacques Soustelle）。因为对东方的向往，他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。通过教师资格会考之后，艾田蒲一度三年寄宿在梯也尔基金会（Fondation Thiers），潜心研究中国，其科目仍还保密。1934年，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与马尔罗（André Malraux）和保罗·瓦扬（Paul Vaillant）共同建立了“中国人民友人”协会（Les amis du peuple chinois）。当时中华苏维埃政权正面临国民党的打击，即将开始长征。在1964年发表的《我们是否了解中国？》一书中，艾田蒲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钦佩以及其对其思想的青睐。那个年代，毛泽东思想在法国正大受欢迎，到1974年如日中天，尤其是因为原样派（*Tel Quel*）的索莱尔斯、罗兰·巴特、克里斯蒂娃等一行人来到了中国。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（Simon Leys）倒是在早两年前就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并且遭到了屈辱；

只有艾田蒲还在《新观察家》中发文为李克曼声援。1974年艾田蒲发表了《我的毛主义40年》这本文集，他在这本书中进行了“自我批评”（如维维昂先生所言），推翻了当年“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”，尤其是波伏娃。

因为艾田蒲早就了解中国，即便这些了解大部分是书本上的知识，并且理性之余还夹杂着不少热切的情感。讲座开始时，维维昂先生播放了一段1958年的视频，是在“大众阅读（Lectures pour tous）”栏目中，主持人对艾田蒲的采访。通过这段视频，我们可以看出艾田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情，他前一年去中国旅行了一周，而那时候正是“百花运动”全面开展的时代。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尤其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，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化给欧洲带来的影响——两卷本的《中国之欧洲》就是明证，他还写了关于道教和儒教的书籍，以及探讨过关于中国古代情色作品、中国的耶稣会教士等多种主题。

维维昂先生同样也讲述了艾田蒲的文学贡献，其作品都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。他发起了对兰波的研究，并主编了“认识东方”系列丛书。但正如维维昂先生所说，尽管艾田蒲写了小说和诗歌，“这都不是他的作品中延续长存的部分，……他没有能像他想的那样成为一名作家”。在艾田蒲的前面，一直有让·波朗这位《新法兰西评论》主编，有这位伟大的作家在扮演文学之父的角色。维维昂先生如此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：“让·波朗是一位艾田蒲永远杀不死的父，而让·波朗可能成功地杀死了作家艾田蒲。”

艾田蒲的成名更多是由于他1964年出版的《您说法语吗？》（*Parlez-vous français ?*），这是一本捍卫法语地位的畅销书。他捍卫法语语言价值，为这种价值的丢失感到遗憾。在其自传《生命线》（*Ligne d'une vie*）一书的第一卷中，艾田蒲提到他在40年代去过亚历山大大学，那里的“穆斯林、犹太人、基督徒、无神论者、希腊东正教信徒可以自由交流，……多亏了有法语传递的价值。”

艾田蒲在中国



钱林森教授和维维昂先生（傅加叶先生、张琦女士摄）

维维昂先生提到，艾田蒲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发起人，并且在中国非常著名，大学里的学者都将艾田蒲视为比较文学之父。北京大学1991年建立的中法文学文化交流研究中心，1995年更名为艾田蒲中心。

钱林森教授提到了他与艾田蒲作品的初次接触。80年代末期，他得到了一份两卷本《中国之欧洲》的复印稿。他说：“我和许钧老师于是决定翻译这本书。我们给艾田蒲写信，他很快就回复了，并给我们寄来了法语原版书。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很少有外文书被引进中国。我们得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，他们鼓励我们翻译这部作品。”《中国之欧洲》的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。在这部先驱译作的影响下，直到今天，艾田蒲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一位大家。该书出版之际，艾田蒲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答应中国大学的邀请来华，也无法在法国收一些中国博士生为弟子。钱林森教授

在法国教过几年书，他非常遗憾没能见到艾田蒲，没能和建立通信联系以久的人当面谈谈。“2002年，艾田蒲去世，在孟华教授的支持下，北大为纪念艾田蒲举办了一场研讨会，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”

钱林森教授继续坚持他的研究，并出版了许多中文作品，尤其是《中国文学在法国》和《法国作家与中国》。他以维维昂先生的话做总结：“人们死去，但思想长存。”



维维昂先生和钱林森教授现场对谈（傅力叶先生、张琦女士摄）

（原文出处：http://french.beijingreview.com.cn/Culture/201604/t20160405_800053816.html。作者：Jacques Fourrier - Beijing Information，译者张琦、周梦琪）